

汪云, 迟菲, 陈安. 中外灾害应急文化差异分析[J]. 灾害学, 2016, 31(4): 226-234. [Wang Yun, Chi Fei, Chen An. Difference of Emergency Cultures between China and Some Foreign Countries[J]. Journal of Catastrophology, 2015, 30(4): 226-234.]

中外灾害应急文化差异分析^{*}

汪云^{1,2}, 迟菲^{1,2}, 陈安^{1,2}

(1 河南理工大学 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 河南 焦作 454000;

2. 中国科学院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190)

摘要: 受诸多因素影响, 中外的应急文化存在着较大差异。对比分析中外应急文化差异, 将有助于我国应急文化的建设和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据此综合对比了中外应急态度差异, 并选取三个角度对中外应急文化差异进行了具体分析。首先从突发事件事前和事后态度的角度, 将应急文化分成四象限, 以每个象限的典型代表国家为例, 将中外应急态度差异进行对比; 接着分析了中外应急中个人作用差异、评价与问责差异以及感恩差异, 并进一步对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 灾害应急文化; 差异分析; 态度; 个人与组织; 问责; 感恩

中图分类号: X915.5; X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11X(2016)01-0226-09

doi: 10.3969/j.issn.1000-811X.2016.01.041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是根据环境和历史的一种有意识的理性选择, 它影响着人类的活动与思维方式。人类学家泰勒将文化视为一个广义的整体, 它囊括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1]。应急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 广义上包括一切与应对灾害及各类突发事件相关的人类行为观念、态度、心理、活动等方式, 之前学者们所研究的灾难文化、灾害文化、灾害应急文化等概念也都属于应急文化的范畴。受政治、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影响, 中外的应急文化存在着较大差异。研究中外应急文化差异将有助于发现我国应急文化的不足和改进方向, 为我国应急文化体系建设提供更好的建议和支持。

国外对于灾害文化的研究, 要追溯到 Harry Moore 在 1964 年首次提出灾害文化 (disaster culture) 这一概念^[2], 他用灾害文化来表示处理重复发生的危险过程中形成的文化防卫集合, 认为灾害文化是某一地区居民应对处理已经发生过或将来可能发生的灾害过程中的判断, 包括实在的、潜在的、社会的、心理上的以及物质上的判断。之后也有很多学者在实证应用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理论上的改进和应用。日本学者在总结北海道浦河镇近海发生的地震灾害损失的经验体会时也提“灾害文化”这一理念, 他认为灾害文化的理念

是通过灾害与人、与社会灾害事件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调整与平衡形成新的关系并启迪、教化天下, 使人对灾害理解逐渐全面深刻的一种文化, 它是对于灾害的认识和实践经验的成果。日本学者所提出的这一概念更加注重文化的精神层面, 而 Harry Moore 提出的“灾害文化”既包含思维层面, 也包含行为层面, 我国学者对于灾害文化的研究基本遵循了 Moore 理论, 认为灾害文化是观念与行为的集合。

国内学者对于灾难应急文化也有一些研究, 这些研究主要针对国内应急文化建设方面, 旨在为我国的应急文化建设提供建议。李昊青等^[3]认为应急文化包括应急物质文化、应急精神文化、应急制度文化和应急行为文化, 并从这四个方面着手提出应急文化建设意见。也有学者将中外灾害应急文化进行过对比研究, 主要集中在中日灾害文化对比上。伍国春^[4]分析了日本灾害文化特点及形成原因, 并结合我国灾害文化现状, 进行对比后建议从文化主体、传承载体以及传播媒体三个方面建设我国的灾害文化。由于日本各种自然灾害发生频繁, 灾害文化发展的也较为成熟, 因此也有学者专门对日本的灾害文化进行研究。王占一^[5]通过解读影片《日本沉没》中的灾难文化, 探讨该影片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分析其中的人物形象, 对日本的社会和文化进行了研究。

* 收稿日期: 2015-05-19 修回日期: 2015-07-0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非常规突发事件的‘事中’评价策略与动态研判方法研究(2010-2013)” (91024004)

作者简介: 汪云(1991-), 女, 安徽芜湖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管理机制设计. E-mail: wonderfulcloud@163.com

通讯作者: 陈安(1971-), 男, 山东东平人,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应急管理、管理机制设计等研究。

E-mail: changel970@163.com

这些学者对应急文化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我国应急文化建设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应急文化的研究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去探讨,之前学者们所研究的角度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研究要么是仅仅针对国内应急文化建设方面提出意见,要么集中在研究某一个国家的应急文化上,没有将各国之间的应急文化差异进行对比研究。本文首先从对待突发事件事前事后态度的角度将应急文化分为四个象限,并以典型国家为代表分析中外应急事前事后态度差异,随后进一步选取应急中的个人作用、评价与问责、以及感恩这三个角度,对中外应急文化差异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

1 预防与应急的态度和行为差异分析

从突发事件应对的事前预防态度和事后应对态度及行为这两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应急文化更加注重事后的主动应对与救援,事前预防虽然一直被人们提到,但在实际应对过程中却仍然过于消极。如果将预防态度和事后应对态度当成平面坐标轴的两个维度,那么就可以画出一个二维坐标图,横坐标表示事件发生前人们对事件的态度,纵坐标表示事件发生后人们应对的态度与行为。突发事件发生前人们持有的态度为积极预防和消极面对,而事件发生后,人们会主动应对与被动应对。据此,可以将坐标图划分为四个象限,分别是“积极预防-主动应对型”,“消极预防-主动应对型”、“消极预防-被动应对型”、以及“积极预防-被动应对型”。中国是典型的“消极预防-主动应对型”,印度是典型的“消极预防-被动应对型”,日本是典型的“积极预防-被动应对型”,而德国则是典型的“积极预防-主动应对型”。将这四个典型国家在二维坐标上标出后,得到如下的四象限图(图1)。下面分别对四种典型国家进行分析。

1.1 中国——“消极预防-主动应对型”分析

中国被认为是突发事件应对中消极预防和主动应对的典型,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积极响应,采用有效应对措施,然而在事件发生前的预防过程中却显得不足,缺乏一定的危机预防意识。

(1) 中国“消极预防-主动应对型”应急文化现象分析

中国虽然自古以来自然灾害频繁,各种突发事件不断,但中国的事前应对措施却很不完善,人们的危机与预防意识也一直欠缺。早在2005年8月由北京专业调查公司发布的《城市居民危机意识》的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民中有40%不知道哪里有避难场所,更有近70%根本没有想到过避难^[6]。即使近些年中国已经开始注重突发事件的事前预防措施,加强了各种突发事件与灾害的宣传以及民众灾害意识的培养,但短时间内仍未见到本质性的变化。舟曲泥石流、芦山7.0级地震中,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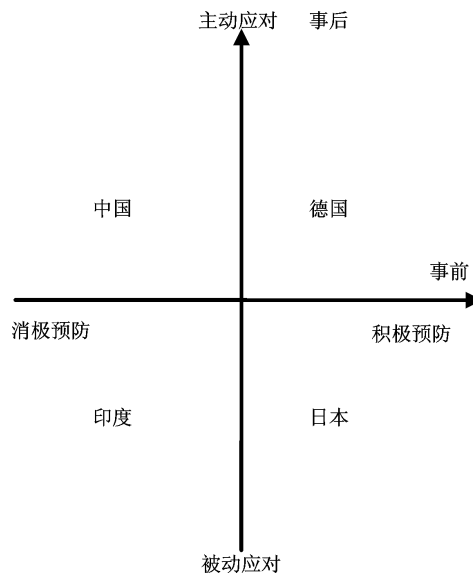


图1 应急文化四象限

总能领导人第一时间奔赴一线,指挥现场救灾,出现全国上下一心共同应对灾难的场面。2008年汶川8.0级地震中,死亡及失踪人数超过9万,损坏道路上千公里,而且都是山区,地形十分恶劣,空降行动面临极大危险。但是我们的救灾效率非常高,几千公里的路上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数万名志愿者自己开车拉着救灾物资奔向灾区,全国各地人民为灾区踊跃捐款捐物。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灾害事件发生后能积极应对,中国人更注重“眼见为实”,这是我国的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特征。

(2) 中国“消极预防-主动应对型”应急文化原因分析

中国人在面对未发生的潜在危机时缺乏足够的认知,危机意识薄弱,这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中国文化先天就具有安命乐生,重生轻死的传统,即便是讲究“清静无为”和“顺生”的道家,也绝少奢谈死亡。“未知生,焉知死?”这是一般中国人对待死亡的态度^[7]。“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可见人们其实对这种长远的忧患危机意识是讽刺和嘲笑的。中国绵延千年的文化里反复宣讲的就是寄托未来,对未来充满信心,即所谓的“乐感文化”^[8]。因此在突发事件发生前,中国人的预防意识和措施就显得不足。

然而一旦突发事件或灾害发生之后,眼睛所能见到的真实画面总能够带给人们很大的冲击,因此人们能够立即采取措施,尽自己所能对突发事件进行应急救援。中国人在突发事件或灾难应急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一致精神是为世界所称道的,这与中国近代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自清末受外国列强屡屡入侵,到20世纪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再到建国初期短暂的共产式发展,这些都教会中国人民保持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危难时刻,众人团结可以对抗一切灾难与困境。“人多力量大”、“众

人拾柴火焰高”正是这种团结精神的最好体现。20世纪末到现在,中国所经历的各种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应对和救援过程中,人们也更加深刻体会到了团结一致、共度难关的强大力量。因此,在突发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民总是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应对。

(3)“消极预防-主动应对型”应急文化的影响与评价

对于“消极预防-主动应对型”的应急文化来说,在突发事件发生以后立刻主动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以减轻事件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事件的受害者,以及降低事件造成的损失。但是,由于缺乏一定的事前预防意识和预防措施,就不能有效地降低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一旦事件发生后,即使事后有一系列应对措施,事件所带来的损失和后果也是无法弥补的。因此“消极预防-主动应对型”的应急文化需要更加注重事前预防意识的培养以及预防措施的准备,以实现在更大程度上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及其带来的损失。

1.2 印度——“消极预防-被动应对型”分析

印度被认为是面对突发事件时消极预防与被动应对的典型代表,不管是突发事件发生前的预警与预防,还是事件发生后的应急应对过程,都存在很大的不足之处

(1) 印度“消极预防-被动应对型”应急文化现象分析

由于印度洋板块活动、季风气候和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印度每年都会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然而,印度现行的应急管理机制却仍然很不完善,即使是在其所强调的灾后救援方面,也频繁暴露出诸多问题。2005年孟买洪灾期间,政府迟迟未能展开搜救和赈灾工作,灾民只能依靠自救^[9]。在2005年以前,印度还没有设置单独的政府机构来负责灾害应急管理事务,各种灾害分别由不同的政府部门负责管理。这种职能设置或是责任划分的指导思想是按专业进行分工,无法满足严重灾害对统一协调和管理提出的苛刻要求。2001年古吉拉特邦7.8级地震才使这个问题得以暴露,最终促使中央政府建立了以总理为首的全国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NCDM)。然而印度民族在主观上却始终拒绝和灾害博弈,依然将对策留在自己心中对于世界的理解上,那就是“主观出真知,静思乃得之”。

在面对死亡上,印度人民也一直抱着非常消极的态度。他们将死亡看成一种“脱离”人生苦海的方式,认为人死后会进入无忧无虑的彼岸极乐世界。表现在对待灾害和死亡的态度上,是对自然界的屈从,和对死亡听之任之的态度。

(2) 印度“消极预防-被动应对型”应急文化原因分析

印度在面对突发事件和灾难时所采取的消极和被动的态度,同印度的社会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印度是世界上受宗教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人们信仰宗教,按宗教教义行事,而印度教或者佛教本身对于灾害和死亡所采取的都是听之任之的态度。印度教徒在精神与物质这个哲学根本问题上表现出重精神轻物质的倾向,在印度教徒眼里,如何自我修行,尽早“脱离”人生苦海,进入无忧无虑的彼岸极乐世界才是最重要的。直至今日,对自然界的屈从和通过苦修获得精神解脱的观念依然在恒河流域广为流行,影响深远。因此,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印度面对灾害始终保留着消极应对的态度。即使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印度宗教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

(3)“消极预防-被动应对型”应急文化的影响与评价

“消极预防-被动应对型”应急文化的国家,由于缺乏事前的有效预防,而事件发生之后的应对措施也明显不足,一旦突发事件发生,其造成的影响和损失都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属于这种类型的国家,从长远来看,只有其在事前灾害意识培养、预防措施以及事后应对方面都努力进行改进和提升,才能降低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和损失,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1.3 日本——“积极预防-被动应对型”分析

日本被认为是面对突发事件时积极预防与被动应对的典型,是因为日本面对死亡的坦然,以及其几近完美的防灾意识和灾害预防体系。

(1) 日本“积极预防-被动应对型”应急文化现象分析

日本有相当完善的事前预防体系,这体现在日本的法律法规、日常教育、城市设备等各个方面。日本的第一个防灾法—《备荒储蓄法》,制定于明治13年,即1880年。之后,日本陆续制定了一系列专项灾害防治法律。日本对于公民防灾意识的培养,是从小就开始的,在之后的教育中也一直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日本将每年的9月1日定为“灾害管理日”,8月30日至9月5日定为“灾害管理周”,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防灾宣传活动;日本政府和相关灾害管理组织机构协同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灾害演练,使公众能训练有素地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同时日本还建立了集防灾教育、防灾训练功能于一体的市民防灾体验中心,由政府出资建设,免费向公众开放,以培养公众的危机意识。北京一位长期从事旅游接待工作的人曾说过,他们接待日本游客时,常常迷惑的是,日本游客放下行李后,就会立刻去察看走火通道。中国人中,100人没有一个会这样做的。有备无患、以防不测,以此来应对突发事件,成为了日本人的定式思维^[10]。

然而,一旦灾难事故发生后,日本人面对灾难就如面对很快就会凋落的樱花一样,对于生命的消亡是很消极的态度。在很多灾难事故发生后,

不管事件状况是否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也不管灾害导致他们生活甚至是生存状况变得多么艰难,日本人总是表现得不慌不乱,似乎不论多么巨大的灾难和多么严重的后果都不会激起他们恐惧与慌乱。2011年东日本9.0级大地震导致福岛核泄漏,远在大洋另一侧的中国民间已经慌乱不已,忙着抢盐囤水囤粮时,日本人甚至都没有表现出一丝恐慌和担忧。因为对他们来说,死亡根本不可怕。日本人面对灾难发生之后的冷静甚至是冷漠,体现的不仅仅是他们不慌不乱、沉着应对,更是他们消极应对以及对于来自死亡恐惧的麻木。

(2) 日本“积极预防-被动应对型”应急文化原因分析

日本有着如此完善的事前预防体系,是因为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是世界上灾害最为繁多的国家。日本在长期和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并不断将实践经验转化为对于民众的防灾教育以及一系列法律制度。日本人基于对灾害的认知和了解,在事前采取尽可能周全的做法,其风险防范的各种细节是其他国家无与伦比的。

日本在突发事件事后应对方面却显得较为消极与被动,是因为他们对于死亡的淡然与冷漠。对于日本人来说,不是会不会发生地震,而是何时与何地发生地震的问题。生命的逝去就如樱花掉落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关心的不是会不会死亡,而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死亡。日本人对死亡的坦然甚至迷恋,形成了独有的死亡美学。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11]中反复写道“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这或许是对日本文化中生死观念的最好体现。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12]中,对日本的民族特性进行了极其细致到位的展现,这部著作被视作反映日本民族性最典型、最有见地的作品。菊花,象征着温驯、美丽、隐逸,刀,象征着武力、好斗、蛮横,两样具有完全相反的涵义的物品构成了这本书的名字,也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奇异性格。这或许是日本文化面对灾害能够坦然面对的最好注解。

(3) “积极预防-被动应对型”型应急文化的影响与评价

“积极预防-被动应对型”型应急文化的国家能够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前就做好充分的准备,培养人们的灾害意识,采取有效的预测、预防等措施。这些准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或避免事件的发生,即使有些事件无法完全避免,由于事前的准备措施较为完善,因此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对突发事件进行处理。然而,被动应对型应急文化的国家对于突发事件的应对更多地依赖于事前的准备,而事件发生之后的应急处置则会略显不足,当事件的影响超出事前准备的措施所能应对的程度之后,被动的应对方式则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事件和降低损失。因此,即使拥有了

较为完善的事前预防措施,这种类型的国家仍然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其事后应急处置的能力,将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控制到最小。

1.4 德国——“积极预防-主动应对型”分析

德国被认为是“积极预防-主动应对型”的典型,在灾害事件发生前后总是能够积极主动进行预防和响应。

(1) 德国“积极预防-主动应对型”应急文化现象分析

德国非常注重灾害的监测和预警。2001年10月,德国建立卫星预警系统进行灾害警示,通过卫星,政府发出的预警信息可以在几秒钟内通过公立和私人的电台传遍全国,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移动电话等方式向民众发出预警报告。为实现预警信息的有效收集整理和发布,德国建立了一套依托卫星的危机预防信息系统,集中了互联网上所有可以找到的危机预防措施信息,并向全社会开放。同时,为便于各种罕见灾害发生时迅速进行信息分析,实现信息共享,德国还建立民事保护和灾难防护领域的内部信息网络,供应急管理的相关部门使用^[13]。

(2) 德国“积极预防-主动应对型”应急文化原因分析

一直以来,德国都以标准化规范化著称,标准化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德国人讲求效率,做事有条例,善于总结和计划。德国社会经济发达,自然环境优越,除了雪灾会在每年冬天袭扰之外,其他方面的灾害都不多。但是德国严谨务实的传统使得他们居安思危,怀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加上德国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灾害预防、预测与应对等各方面技术也较为成熟,因此能够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实践过程中建立了一套比较健全和完善的应急管理体系。

(3) 德国“积极预防-主动应对型”应急文化的影响与评价

拥有“积极预防-主动应对型”应急文化的国家,不仅具有很强的灾害意识和完善的事前预防措施,同时还拥有清晰明确的主动应对意识和较为完备的事后应急方案。因此这种类型的国家一方面能够做好事前的预测和预防,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或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即使事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也能够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从而将突发事件的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积极预防-主动应对型”应急文化也是其他类型的应急文化学习的典范。表1为四种应急文化的对比。

2 中外应急中个人和组织文化差异现象与原因分析

突发事件发生之后,相关部门需要立刻采取行动,对事件进行处理和控制。然而,由于突发

表 1 四种类型应急文化对比

类型	“消极预防－主动应对型”	“消极预防－被动应对型”	“积极预防－被动应对型”	“积极预防－主动应对型”
典型国家	中国	印度	日本	德国
事前	灾害意识弱，预防措施不足	灾害意识弱，预防措施不足	灾害意识强，预防措施充分	灾害意识强，预防措施充分
事后	应对态度积极主动，措施充分	应对态度不主动，措施不足	应对态度不主动，措施不足	应对态度积极主动，措施充分
影响	无法事前减少或避免事件，事后可挽救一定损失	事前、事后都无法有效降低影响和损失	事前可有效降低或避免事件，事后无法有效挽救	事前、事后都能有效降低影响和损失
建议	加大事前预防意识和措施	加强事前、事后应对意识和措施	加强事后应对意识和措施	完善和提高当前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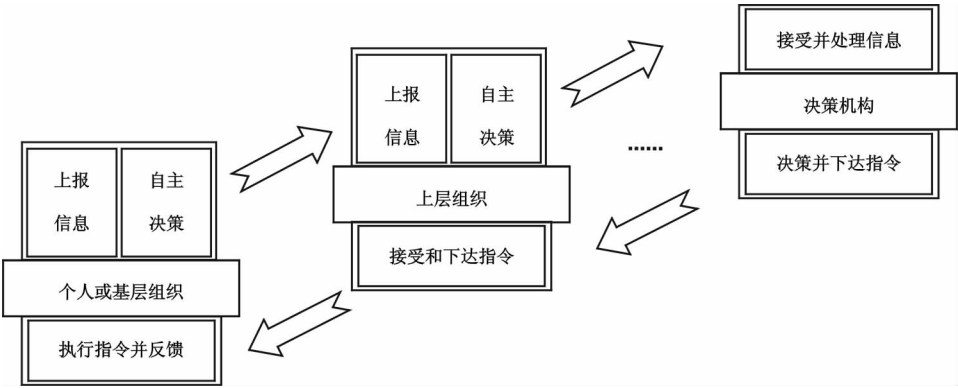


图 2 美国突发事件处理及信息传递模式

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较多，在事件应对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正常处置流程无法应对或超出当前处理水平的状况。面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的“意外”状况，受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差异的影响，中外在应对过程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里以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为例，对比分析中美两国个人和组织在应急中的表现差异。

2.1 中美个人和组织在应急中的作用差异现象分析

(1) 美国个人和组织在应急中的作用体现

美国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理想与价值的实现，以及个人在组织中的作用^[14]。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救援过程中，掌握更全面信息的个人往往能够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他们可以根据所掌握的信息以及自己的判断，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事件的进一步恶化，降低事件所造成的损失。此时，这样关键个人所采取的措施是及时、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是高效的，因为他并没有过多地受到组织的约束和限制，而其所带来的作用也是可以超越于组织之上(图2)。这一点在美国影视作品中具有很清晰的体现。不管是钢铁侠、蜘蛛侠、蝙蝠侠这样的超级英雄系列，还是《白宫坠落》这样体现普通公民在危急关头发挥重要作用的电影，都很好地体现了正常程序无法继续发挥作用时，个人能够有机会凭借自身能力以及掌握的信息发挥关键作用。

个人主动发挥作用的积极性得到支持和鼓励，不仅能激发个人在组织中的创造性，很多时候还能允许个人在应急处置的危急关头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让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得到控制，从而大大降低事件带来的损失。

(2) 中国个人和组织在应急中的作用体现

与鼓励个人发挥作用的美国相比，中国情况却截然不同。一旦突发事件发生，或是个人掌握到进一步的信息，发现事件或掌握信息的个人一般都会将事件和信息逐级上报给最终具有决策权力的部门，而最终决策部门根据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决策指挥，再逐层对下级实施部门发布指示和命令(图3)。此时，组织和程序的作用是远在个人之上的。经过如此长的信息传递过程，很有可能会错过应急处置的最佳时机，事件也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带来更多的损失。2013年青岛输油管爆炸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当管道泄漏刚被发现时，情况并没有严重到不可控制的程度，只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爆炸事故的发生。然而，事实却是发现泄漏之后，该信息被一层一层地向上级汇报，直到有关部门作出应对指示，已经是发现泄漏的十几个小时之后了。由于个人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错过了最佳处理时期，导致泄漏不断增加，最终酿成了输油管爆炸的惨剧。

信息逐层上报，命令和指示逐级下达，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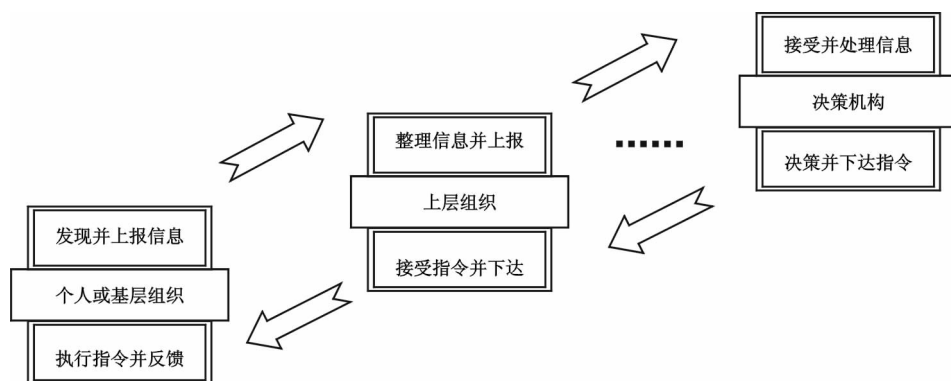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突发事件处理及信息传递模式

的组织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决策的可靠性,但经过如此长的信息传递过程,也会浪费大量宝贵的应急时间,很多时候甚至会错过最佳处置期,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最终造成更大的损失。

2.2 个人与组织在应急中的作用差异原因分析

分析造成中美两国应急文化中个人与组织作用差异的原因,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①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文化与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个人在面对突发事件中的“意外”状况时,个人积极采取措施的主动性存在差异;②中美两国的制度及权力分配差异,导致个人在事件应对处理过程中的自由程度不同。

(1) 美国主动发挥个人作用的原因分析

美国不论组织还是个人,在其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层次,都是接受和鼓励关键个人作用发挥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这是因为,美国从建国到现在的几百年来都是一个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离开自己的国家前往美国,为的是摆脱原来的统治及束缚,去追寻更多的自由和平等。美国人认为机会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应该通过努力去获取成功、实现个人价值,因此竞争意识以及个人英雄主义是美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5]。一直以来他们都在追求和强调自我意志的表达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这种对于实现个人理想和个人价值的狂热追求便构成了在危急关头积极采取措施发挥作用的最主要动力。

另一方面,美国不论公司部门或是政府机构,他们在管理成员时,都非常重视管理的弹性,注重成员个性的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有很大机会能够得到组织的支持并付诸实施。正因为如此,个人在有机会发挥关键作用时,并不会过多地受到来自组织的约束和限制。

(2) 中国个人作用难以发挥的原因分析

在中国,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过程中,很少有个人作用超越组织之上的,组织的作用一般远远大于个人。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给人们带来的集体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组织和集体甚至是国家利益当前,儒家文化一直倡导的是牺牲小我而成就大我,因此个人意愿以及竞争

意识从未得到过鼓励。此外,个人在维护集体主义的过程中,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对集体和组织的依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面对突然发生的事故或灾难时,一旦当前流程规定无法给出有效处理方案,人们更多地是被动地等待组织或者上级的指示,而不是主动对状况形成一定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

除了集体主义思想给人们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影响之外,中国权职层次严格划分组织制度也给组织中的个人行为带来了较强的约束和限制,使得个人几乎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即使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个人也很少会选择去“擅自作决定”。个人或是基层组织所能做的往往只是根据要求将事件上报,并根据流程规定或上级指示,采取相应的措施。然而,正如输油管发生爆炸之前,总会有小范围泄漏发生一样,很多事故或突发事件发生之前,也都会出现一些可以控制的苗头或征兆,而这发现些苗头或征兆的往往都是基层的组织或个人。但是更多时候,人们所担忧的是一旦处理不当导致了更大的损失,自己就会被追究责任,因此他们宁愿按部就班选择程序化的方法,或者只是将情况逐级上报,也不愿意根据自己对事态的认知,及时采取可能更加有效的应对方案。

3 评价与问责文化差异现象与原因分析

突发事件处理完毕之后,对于事件以及应急处置工作的总结是必不可少的,一般包括评价和追责两个部分。追责是建立在评价的基础之上的,评价的标准和方式直接决定了评价的结果。中外在评价方式和标准上存在着不同,这也就导致了中外的评价结果和追责方式及对象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中西方之间表现的最为明显。

3.1 中西方评价与问责文化差异现象分析

(1) 西方发达国家应急评价与问责特点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上优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和组织管理制度上也更加完善,这一点在德国体现的尤其明显。德国人

在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处置过程中,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工作流程作为指导,相关组织或个人都可以根据规定的操作流程进行处置。同样地,对于组织或个人在应急处置中的行为功过也可以根据这个应急管理体系进行清晰的界定和评价,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只要按照规定流程进行操作和处置,不管事件的结果严重程度如何,负责处置的部门和个人也只是尽了自己本分的职责,并无功过可言;②只有在危急关头,正常操作程序或流程无法控制当前事态时,组织或个人采取超出规定的措施,从而挽救了损失,这时候才会认为是有功的;③有过的行为则是未能按照规定要求进行操作,未尽到规定的职责甚至造成更多损失的行为。

完善的应急管理体系让组织和个人功过的评价变得公正清晰,基于评价之上的追责,也因此而更加让人信服。只要事前预防和事中应对都严格按照应急管理体系的要求去完成了,那些无法控制的外力所造成的损失,如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也不会去追究有关应对组织或个人的责任。这样一来,没有人会因为害怕被问责而隐瞒或谎报事情的真实状况,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对处置变得更加规范,事件的严重程度和造成的损失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降低。

(2) 中国应急评价与问责特点分析

在中国,相关体制和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功过界定和责任追究都不够清晰明确。重大突发事件或灾难发生,各组织及个人共同努力度过难关之后,总结与表彰大会往往是必不可少的,这一过程会对事件应对处置中贡献突出的组织或个人进行表彰,同时也会对应付处置不力的组织或个人追究相应的责任。对于那些超出自己身本岗位要求而做出更突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进行表彰,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于缺乏合理有效的应急管理体系,各部门之间职责划分不明确,这就导致很难判断哪些组织或个人是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真正有功劳的。很多时候,人们只是根据各个组织和个人在实际应对中的贡献进行判断,贡献越大,相应的“功劳”也就越大。这样一来,很多按照要求完成自己本职内工作的个人和组织也能够因他们的贡献而获得相应的“功劳”,从而得到表彰。

与表彰功劳相对应的是事件中的责任追究过程,不完善的评价体系必然会带来不完善的责任追究体系。突发事件发生后,一般都会有相关的“责任追究”对象,这里的责任对象有可能是引起事件的责任方,也有可能是事件应对过程中处置不力的组织或个人,还有可能是一些“无辜”受责的人。出现“无辜”受责的人可能有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如果事件的责任方无法确定时,按照中国当前的做法,相关部门尤其是部门领导或负责人则首当其冲成了被问责的对象;第二种则是组织中某个人操作失误引起事故,或加重了当前的

损失时,不仅仅是出现失误的个人要被问责,他的上司甚至部门领导不管是否有责任,也都很有可能受牵连而被处罚。这样的连带问责方式也就进一步导致了突发事件或灾难发生后,所有人都噤若寒蝉,不敢擅自采取措施,即使有时候这些措施能够及时有效地控制事件的进一步恶化。更有甚者,事件发生后某些相关负责人为了尽可能免受责罚,会故意掩盖事件真相,或谎报事故严重程度。2003年SARS首先在广东出现时,当地官员因为担心自己因处置不力而利益受损,于是选择了封锁消息内部化解危机。然而这种封锁信息、内部处理的做法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得疫情的蔓延进一步失去控制,最终导致了SARS在全国暴发的结局。

3.2 中西方评价与问责文化差异原因分析

中国与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评价与问责文化上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二者的应急管理体系差异。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都较为成熟,社会制度相比之下也更加完善,以标准化著称的德国在应急管理方面同样也有着严格的管理标准。然而中国社会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社会制度也难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应急管理体系中的评价与问责制度也同样如此(表2)。

(1) 德国评价和问责体系形成原因分析

德国比较完善的评价和追责体系,得益于其健全的社会和组织管理机制。德国地处欧洲中心,社会经济发达,自然环境优越,而其最大的特点是以标准化和规范化著称,标准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德国人谨慎严谨,做事有条理,讲求效率,善于总结和规划,生活中如此,突发事件应急方面亦是如此。虽然很少发生大型灾害事件,但是德国严谨务实的传统使得他们居安思危,怀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实践过程中建立了一套比较健全和完善的应急管理体系。因此,在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对处置以及事后评价问责方面,就可以做到更加清晰规范和公正。

(2) 中国评价和问责体系形成原因分析

中国当前的应急评价与问责体系尚不完善,这与我国社会制度和当前发展状态有着必然联系。我国虽然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但由于古人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不够发达,很多时候无法真正了解各种灾害的真实原理,对灾害的认识往往采用的是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等学说去解释。发展到近代,人们对于灾难所形成的应对机制更多地集中在灾后救济和补救层次。一直到20世纪之后,人们才逐渐通过科学手段对各种灾害的产生、发展和应对有了一定的认识,而灾害预测、预防和应对方面的制度则发展的更晚,到现在也没有一套成熟的灾害及突发事件应对管理体系。应急管理体系的不完善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应急处置中的职责不明确,进一步造成事后的

评价缺乏统一可靠的标准,人们便在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理中逐渐形成了当前的评价和问责方式。

表2 中西方评价与问责差异对比

国家	中国	西方
评价	缺乏统一客观标准,赏罚不明标准明确,公正客观	
问责	缺乏标准,有时会累及无辜	责任清晰,公正客观
影响	隐瞒事件,推卸责任	事件得到及时有效处理

4 感恩文化差异现象与原因分析

突发事件或灾难发生之后,得到救助的人们常常会对向他们施以援手的人表达感谢和感恩,感恩文化不仅仅作为灾难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整体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中外的感恩文化却深深受到历史和价值体系等因素的影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较大,因此这里仅选取美国为例。分析中美感恩文化的差异,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别是感恩方式、感恩对象以及感恩意识(表3)。

表3 中美感恩文化差异对比

国家	中国	美国
方式	原则性较弱	就事论事,有原则
对象	提供帮助的人或其亲人	提供帮助的人或社会
意识	集体受助时,感恩意识弱	感恩意识较强

4.1 中美感恩文化差异现象分析

(1) 美国人表达感恩的特点分析

首先,美国人表达感谢的方式更多的是以就事论事的方式,接受帮助与回报的过程也都具有较强的原则性,这一点同日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日本人在接受别人的恩惠后,如果将来对方需要,会不余遗力地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进行回报,甚至包括付出生命的代价^[15]。而美国在感恩回报时则体现出很强的原则性,生活上的帮助绝不会以职位提升的方式得到回报。

其次,美国人在进行回报时,对象却并不一定是施恩者。一个穷苦的孩子受到别人资助获得成功可能选择的是去资助更多穷苦的孩子,也就是说,美国人会通过回报社会的方式对自己曾经获得的帮助进行感恩。

最后,不管美国人进行感恩的方式和回报对象如何,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受助者只要有能力,接受帮助后是一定要进行回报的,有时候这种对于回报的强烈心理甚至超过了对于索取帮助的渴望。

(2) 中国人表达感恩的特点分析

首先,与就事论事的感恩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感恩文化。接受了物质上的帮助后,除了物质或金钱上的亏欠以外,受助者往往还会产生心理上的亏欠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情债。这一点与日本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如日本那么极端。这是因为日本的传统文化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古代文化,而日本

的地理环境等特征又发展了其独有的略显极端的心理恩惠文化。

其次,中国人在进行回报时,往往更多地是针对施恩者本人或与其关系非常密切的亲人或者朋友。即使当前社会中也受助者以回报社会的方式来对当初所获得的帮助进行回报,但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所选择的回报对象仍然是提供帮助的人,或者是与其关系密切的亲人或者朋友。

4.2 中美应急文化中感恩文化差异原因分析

中美两国在感恩方式、感恩对象以及感恩意识上的差异主要是由思想价值观念以及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所造成的。

(1) 美国感恩文化形成原因分析

美国人的原则性不仅仅体现在感恩与回报的过程中,还体现在生活工作等各个方面。这与他们所受的价值观念的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教育不仅仅包括正规的学校教育,还包括渗透于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各种非正规的隐性教育^[16]。因此,美国人对于原则的坚持就如同他们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一样根深蒂固。

美国以回报社会的方式进行感恩,是他们社会责任意识的体现。美国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其社会福利制度相比之下也更加完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社会福利所带来的好处。因此,当他们对所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进行回报时,会选择通过回报社会的方式给更多人带去帮助的人自然也就不在少数。

而美国人对于回报所持有的十分强烈的渴望,则和美国所提倡的人人机会平等和竞争意识是紧密相关的:每个人都有通过努力获取成功的机会,不劳而获的心态以及一开始就放弃努力是被所有人所不能接受的,竞争意识深深扎根于每一个美国人的信念之中。美国人以不工作而仅仅靠领取政府救助维持生活的方式为耻,则是这一思想价值观念的最好体现。这些正如奥巴马在其就职演说中所强调的:“无论是勤劳、诚实、勇气、公平竞争、宽容以及对世界保持好奇心还是对国家的忠诚和爱国主义都是历久弥新的,这些价值观是可靠的,它们是创造美国历史的无声力量”^[17]。

(2) 中国感恩文化形成原因分析

受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影响,尤其是人身依附的思想影响,物质上的给予有时候更容易带来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亏欠。这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拥有土地谁就拥有更多资源,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多的权与势。而那些受封赏得到大量土地的人,往往也是有权有势之人。因此,土地代表了物质资源,也代表了权与势,物质和权势是并存的。而那些物质匮乏的贫苦人民不得不依附于物质资源丰富、有权有势的官僚和地主们,一旦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物质资源,便感恩戴德,或多或少地产生了精神上的亏欠心理,并进一步发展成为用劳力或其他任何可

能的包括人身依附的方式进行回报,卖身为奴便是这种状况发展到极致的表现。“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就在这样的心理亏欠感的作用下产生了。

然而即使在个人如此之强的感恩意识之下,却产生了群体无感恩意识的现象,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意识之中,处于劣势的群体理应接受别人的馈赠和帮助,并且是无偿的接受。对于物资的需求是一方面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前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念下,他们不需要对所获取的物资和帮助进行偿还,更不会有偿还的意识。追究这种群体无感恩意识产生的原因,则可能和集体主义思想以及国家的统筹分配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5 结论

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国内的灾害应急文化近些年才逐渐受到关注。并且,随着各种灾难事故的不断发生,灾害应急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本文从突发事件应急的事前事后态度出发,将应急文化分成四个象限,并结合四个典型国家对比分析了不同象限的应急文化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选取了应急中的个人作用、评价与问责方式,以及感恩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中外应急文化的差异以及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对研究灾害应急文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聂琳. 中国应急准备文化理论综述[J]. 科协论坛, 2012

- (7): 189 - 190.
- [2] Moore H E, Bates F L. And the winds Blew[M]. Austin, Texas: Hogg Foundation for mental health, University of Texas, 1964.
- [3] 李昊青, 刘国熠. 关于我国应急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J]. 中国公共安全: 学术版, 2013(2): 34 - 39.
- [4] 伍国春. 中日灾害文化对比[J]. 中国减灾, 2012(18): 37 - 39.
- [5] 王占一. 《日本沉没》中的灾难文化—日本人的危机意识解读[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 [6] 丘峦. 中评网 社评: 中国人普遍缺乏灾害危机意识[EB/OL]. (2008 - 02 - 03) [2014 - 12 - 19]. <http://www.cmntt.com/crm - 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 coluid = 93&kin did = 2773&docid = 100561919&mdate = 0203003440>.
- [7] 丁颖. 论死亡意识教育——向死而生的教育视角[D]. 开封: 河南大学, 2006.
- [8] 张洁玉. 中美灾难片危机意识差异探源[J]. 世界文学评论, 2011(1): 276 - 278.
- [9] 黄云松, 黄敏. 印度灾害应急管理政策与法律[J]. 南亚研究季刊, 2009(4): 100 - 105.
- [10] 吴飞. 日本防灾立法的体制和精神[EB/OL].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网. (2008 - 07 - 24) [2014 - 12 - 19]. http://www.rky.org.cn/c/cn/news/2008 - 07/24/news_5881.html.
- [11] 村上春树. 挪威的森林[M]. 林少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 [12] 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M]. 田伟华, 译.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1.
- [13] 卢力红, 商靠定, 张学魁. 发达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对我国的启示[J]. 武警学院学报 2008, 24(10): 5 - 8.
- [14] 郝芙蓉, 张潇. 由奥斯卡奖看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及其趋向[J]. 电影文学, 2013(23): 18 - 19.
- [15] 夏玉玲. 日本人的恩惠意识及其文化根源[J]. 山东文学, 2009(6): 131 - 133.
- [16] Robert N. Bellah. 心灵的习性: 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M]. 周德明,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 [17] 谢狂飞. 美国品格教育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2.

Difference of Emergency Cultures between China and Some Foreign Countries

Wang Yun^{1, 2}, Chi Fei^{1, 2} and Chen An^{1, 2}

(1. Safet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of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 China;

2. Institute of Policy and Manage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90,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y culture 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very different between foreign countries and China.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oreign countries' emergency culture and Chinese's will be goo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Herein,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emergency between foreign countries and China are discussed, and three detailed aspects are analyzed further. Firstly, emergency culture wa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ttitude before and after emergency occurrence, and each part was discussed by the example of one typical country. Then the differences of emergency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were analyzed from the view of personal role, the way of evalu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 and appreciation culture, and so are the reasons behind these differences. Analysis found that China needs to encourage personal role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to enhance its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to learn advanced ideals and values from other countries.

Key words: emergency culture; difference; attitude;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 appreciation